

十三經注疏

毛詩注疏

〔漢〕毛亨傳

〔唐〕孔穎達疏

〔漢〕鄭玄箋

〔唐〕陸德明音釋

中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014036124

1222.2

32

V2

毛詩注疏

〔漢〕毛亨傳
〔唐〕孔穎達疏

〔漢〕鄭玄箋
〔唐〕陸德明音釋

朱傑人李慧玲整理



1222.2
32
V2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

北航

C1715584

十三經注疏

毛詩注疏卷第八八之一

幽七月詰訓傳第十五

陸曰：「幽者，戎狄之地名也。夏道衰，后稷之曾孫公劉自邰而出居焉。其封域在雍州岐山之北，原隰之野，於漢屬右扶風郇邑。周公遭流言之難，居東

都，思公劉。大王爲幽公，憂勞民事以此叙己志而作七月鴻鵠之詩。成王悟而迎之，以致太平。故大師述其詩爲幽國之風焉。」

幽譜

幽者，后稷之曾孫也。公劉者，自邰而出，所徙戎狄之地名，今屬右扶風栒邑。周本紀云：「后稷卒，子不窩立。卒，子鞠陶立。」是公劉爲后稷之曾孫也。生民云：「即有邰家室。」本紀云，舜封后稷于邰，公劉因封不改，故知公劉自邰而出也。公劉之篇說公劉爲狄追逐而徙居，經云：「度其夕陽，幽居允荒。」本紀稱公劉在戎狄間，知幽是戎狄之地名也。漢書地理志云：右扶風郇邑縣有幽鄉，詩公劉所邑。是漢時屬扶風郇邑也。言自邰而出者，杜預云：幽在新平漆縣東北，邰今始平武功縣所治釐城是也。邰近而幽遠，從內出外，故言出。公劉以夏后太康時失其官守，竄於此地，猶修后稷之業，勤恤愛民，民

咸歸之，而國成焉。國語云：「昔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、夏，及夏之衰，棄稷弗務，我先王不窟用失其官而自竄於戎狄之間。」韋昭云：「幽西近戎，北近狄。」周本紀亦云，不窟奔戎狄之間。此云公劉竄於此地者，案此公劉之篇說公劉遷幽事皆詳悉，自邵徙幽必從公劉始矣。蓋不窟之時已竄幽地，尚往來邵國，至公劉而盡以邵民遷之也。本紀云：「公劉卒，子慶即立，國於幽」是也。定國於幽自公劉始也。韋昭注國語以爲不窟當大康之時，公劉乃不窟之孫，不應亦當大康之世，而此云公劉以大康時失官守者，周語止云夏之衰也，不言始衰之主。書序云「大康失邦」，則夏后之衰自大康爲始，故繫大康言之。其實公劉適幽不當大康之世。鄭據外傳之文，取不窟之事以爲說耳。本紀云：「公劉雖在戎狄間，復修后稷之業，民賴其慶，百姓懷之。周道之興，自此始也。」又公劉之篇具述公劉居幽愛民之事，是民歸之而成國也。其封域在禹貢雍州岐山之北，原隰之野。禹貢雍州云：「荆、岐既旅，原隰底績。」是岐山原隰屬雍州也。太王始入居岐之陽，明幽在岐山之北。公劉之篇說公劉居幽，度其原隰以治田，是幽居原隰之野。至商之末世，大王又避戎狄之難而入處於岐陽，民又歸之。詩綿傳及書傳略說皆有其事。公劉之本紀云：「公劉復修后稷之業，古公復修后稷、公劉之業，是皆能守后稷之教，不失其德也。」旱麓序云：「周之先祖世修后稷、公劉之業」，而鄭獨言公劉、太王者，以周公之作七月，主意於此二人，故特

言之。成王之時，周公避流言之難，出居東都二年。金縢云：「武王既喪，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曰：『公將不利於孺子。』」周公乃告二公曰：『我之弗辟，無以告我先王。』周公居東二年，則罪人斯得。」是周公避流言之難，出居東都二年也。金縢直云「居東」，不言東都，周公避居固當不出畿內，自然在東都。於時實未爲都，而云都，據後營洛而言之耳。周公在東，實出入三年，言二年，順金縢之成文。

思公劉、太王居幽之職，憂念民事，至苦之功，以比序己志。此釋作七月之意也。以公劉遭夏人之亂，太王有戎狄之難，或出或入，其居幽之時教

民以蠶農爲務，使衣食充足，憂念民事，有至苦之功。由其積德，勤民子孫，卒成王業。

周公既出居東

都，恐王業毀壞，亦憂念民事，庶成周道，其意與公劉、大王之志同，不得自言己身憂國之心矣，無以發明己志，故作七月之詩，仰陳公劉、大王以比己身、序己志。知周公之作七月其意必如此者，以序云

襄二十九年左傳

「周公遭變故，陳先公風化之所由，致王業之艱難」。言「遭變」，是遭流言乃作也。

季札見歌幽

，曰：「美哉！樂而不淫，其周公之東乎？」明在東都作之也。七月之詩非刺成王，非美

成王，無故說先公之風化，陳王業之艱難，則是思念先公，用以比序己志也。本詩周公所作，大師題之

曰幽，明其然矣。而先公在幽凡經十世，知唯念公劉、太王者，以公劉初居幽之主，太王終去幽之君，俱是先公之後，皆有事難之故。周公身遭事難，追念處幽先君，明是念其俊者，故知周公所念，念此二人。若然大王既遭事難，能守后稷之教，乃在居岐之後，周公思居幽之事，知其亦念大王者，緜篇說大

王之德云「民之初生，自土沮、漆」，言居幽之時，得民之意，民戀其德，故與俱遷。明知思念幽事，其

意亦及大王也。鄭於上句言周公居東二年，此句說其作詩之意，欲明七月之作在此二年之中，因尚書有二年之文，故言之耳。非謂居東二年始作七月也。何則？序云「周公遭變」即作，不應坐度二年方始爲詩，七月之作當是初出之年也。後成王迎之反之，攝政致太平。其出入也一德不回，純似於公劉、大王之所爲。太師大述其志，主意於幽公之事，故別其詩以爲幽國變風焉。金縢云「惟朕小子其新逆」，是成王迎而反之，代成王治國政，而致太平。其出居東都也，其入攝王政也，常守專一之德，不有回邪，純似公劉、大王之所爲也。周公作詩之時，有自比二人之意，及其終得攝王政，其事又純似之。此詩用於樂官，當立題目。大師於是大述周公之志，以此七月之詩主意幽公之事，故別其詩，不合在周之風、雅而以爲幽國之變風焉。此乃遠論幽公爲諸侯之政，周公陳之，欲以比序己志，不美王業之本，不得入周、召之正風也。又非刺美成王，不得入成王之正雅。周公，王朝卿士，不得專名一國。進退既無所繫，因其上陳幽公，故爲幽之變風。若所陳本非幽事，無由得繫於幽。周公事若不似，於理亦不可繫，此詩追述幽公事，又相似，故繫之爲宜也。春官籥章云，吹籥以歌幽詩。則周制之前已繫幽矣。謂之變者，以其變風、變雅各述時之善惡，七月陳幽公之政，東山以下主述周公之德，正是變詩美者，故亦謂之變風。公劉亦陳幽事，不繫幽者，召康公陳公劉以戒成王，猶召穆公陳文王以傷大壞，主者意爲雅，不得列爲風也。鴻鵠以下不陳幽事，亦繫幽者，以七月是周公之事，既爲幽風，鴻鵠以下亦是周公之事，尊周公使專一國，故并爲幽風。故鄭志張逸問：「幽七月專詠周公之德，宜

在雅，今在風，何？」答曰：「以周公專爲一國，上冠先公之業，亦爲優矣。所以在風下，次於雅前，在於雅分，周公不得專之。」逸言「詠周公之德」也，據鴟鴞以下發問也。鄭言「上冠先公之業」，謂以七月冠諸篇也。以先公之業冠周公之詩，故周公之德繫先公之業，是於周公爲優矣。次之風後雅前者，言周公德高於諸侯，事同於王政，處諸國之後，不與諸國爲倫。次之小雅之前，言其近堪爲雅，使周公專有此善也。此幽詩七篇，七月、鴟鴞是出居時作，其餘多在入攝政後。鄭以爲周公避居之初是武王崩後二年，成王年十三也。「居東二年，罪人斯得」，成王年十四也。迎周公反而居攝，成王年十五也。七年致政，成王年二十一也。故金縢注云，文王十五生武王，九十七而終，終時武王八十三矣。於文王受命爲七年。後六年伐紂，後二年有疾，疾瘳後二年崩。崩時年九十三矣。周公以武王崩後三年出，五年秋反，而居攝四年作康誥，五年作召誥，七年作洛誥，伐紂至此十六年也。作康誥時成王年十八，洛誥時年二十一也。即政時年二十二也。然則成王以文王終明年生也。是鄭辨武王崩及周公出入之事。知然者，案大戴禮文王世子篇云：文王十三生伯邑考，十五生武王。則武王之年少於文王十四歲。文王世子云：「文王九十七而終，武王九十三而終。」武王既少文王十四歲，文王九十七而崩，知武王於時年八十三也。書傳云：「文王受命七年而崩。」是文王崩時受命七年。尚書序云：「十有一年，武王伐殷，作泰誓。」案經泰誓上篇說武王觀兵時事，是受命十一年。泰誓下篇云還歸二年而後伐紂，是伐紂之時受命十三年也。文王崩至十三年始伐紂，是崩後六年也。金縢云：武王「既克商二年，王有疾，弗豫。」是伐紂後二年有疾，從文王之崩至武王有疾，積八年矣。文王崩時，武王已八十三矣。至此則九十一也。武王九十三

而崩，故知瘳後二年崩也。知周公以武王崩後三年出者，禮，君薨，百官總已而聽政於冢宰三年。定四年左氏云：周公爲太宰以右王室。周公既爲大宰，武王初崩，總攝王政，自是常事，管、蔡不應流言，成王不應致疑，明是三年喪畢，周公不授王政，故流言耳。案周書武王以十一月崩，則崩後一年十二月，朞而練。二年十二月，祥而祭除。崩後三年，管蔡乃流言也。金縢云：「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」，周公乃告二公曰：「我之不辟，無以告我先王。」是周公於流言之年避位而出，是武王崩後三年也。金縢又云：「周公居東二年，罪人斯得。」注云：「罪人，周公之屬與知攝者。周公出，皆奔，二年盡爲成王所得。」言三年者，并數出年，是崩後四年也。又曰：「於後公乃爲詩。」注云：「於二年後也。」上既言二年，又別言於後，明是二年之後也。又曰：「秋大熟，未穫。」注云：「秋謂周公出二年之後，明年秋也。」此秋文承於後之下，於後既是二年之後，明此秋是二年之後。謂居東二年，武王崩後五年也。金縢云：「秋大熟，未穫」之下即云「惟朕小子，其新迎」，是周公即以其年反也。周公將攝，出避流言，今成王自新迎之，明其反即居攝，武王崩後五年，即是攝政之元年。書傳稱周公攝政四年建侯衛，五年督成周，七年致政成王。言建侯衛是封衛侯。康誥論封衛之事，是四年作召誥也。召誥論營洛邑成周之事，是五年作召誥也。洛誥論致政成王之事，是七年作洛誥也。鄭言作康誥時成王年十八，作洛誥時二十一，然則成王以文王終明年生。所以知者，書傳略說云：「天子、太子年十八曰孟侯。孟侯者，於四方諸侯來朝，迎於郊。」注云：「孟，迎也。」案康誥經云：「王若曰，孟侯。」則封康叔之時成王年十八。書傳言周公攝政四年，建侯衛，據孟侯之文，知攝政四年成王年十八。又攝政七年成王年二十一也。逆而推之，則知成王

於攝政元年年十五，周公出年年十三，武王崩年年十歲。計文王崩後十年，武王始崩，自然文王崩之明年生成王也。由此而驗之，故知成王年十三之時，周公初出居東，二年，十四之時，罪人斯得。十五年之時反而居攝也。此譜言「居東」二年，思公劉、大王以比序己志，則七月之作在出居二年之中，不知其作之在何年，當在鴻鵠之前。鴻鵠之作，則在居東三年。金縢云：「居東二年，罪人斯得，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，名之曰鴻鵠。」既言二年，別言於後，既與「罪人斯得」別年，則上文「居東二年」并初出之年爲二年，作詩之時爲三年。是周公居東三年成王十五年之時作鴻鵠也。伐柯序云：「刺朝廷之不知。」言「刺朝廷」，則是刺羣臣，不刺成王，宜在雷雨大風之後，啓金縢之前。知者，若在雷風之前，則王與羣臣悉皆未悟，不得獨刺羣臣。若啓金縢之後，則羣臣亦悟，無所復刺。故伐柯箋云：「成王既得雷雨大風之變，故迎周公，而朝廷羣臣猶惑於管、蔡之言，不知周公之聖德，疑於成王迎之，是以刺之。」是鄭以伐柯爲既得雷雨之後，金縢之前作也。九跋序與伐柯序同刺朝廷之不知，首章言王欲迎周公，二章以下說迎之事，當是周公既反而作也。書傳稱，周公居攝，一年救亂，二年克殷，三年踐奄。多方云：「惟五月丁亥，王來自奄。」注云：「奄國在淮夷之傍，周公居攝之時亦叛，王與周公征之，三年滅之，自此而來歸。」然則周公之歸，在攝政三年東山勞歸士之時。經云「自我不見，于今三年」，明周公以秋反而居攝，其年則東征，三年而後歸。既歸，乃大夫美之，作東山也。若然，周公以秋反而即東征，必是秋冬遣兵，而東山經云：「倉庚于飛，熠熠其羽。」箋云：「倉庚，仲春而鳴，嫁娶之候也。歸士始行之時，新合昏禮。」秋冬行而云「新合昏」者，周公悅勞歸士，言其新昏也。非是六軍之士皆新昏。〔二〕設令發兵之前一二年

爲昏，猶是新昏，不必以起兵之月始爲昏也。破斧經稱「東征」，則是征時之事，其作必是東山之前，未知定是何年。狼跋序云：「美周公也，美不失其聖。」經云：「公孫碩膚。」言周公遜遁去位，避成功也。案書序云：「召公爲保，周公爲師，相成王爲左右。周公致政之後留爲大師。」是狼跋之作在致政之後也。計此七篇之作，七月在先，鴻鵠次之。今鴻鵠次於七月，得其序矣。伐柯、九罭與鴻鵠同年。東山之作，在破斧之後，當於鴻鵠之下。次伐柯、九罭、破斧、東山，然後終以狼跋。今皆顛倒不次者，張融以爲簡札誤編，或者次詩不以作之先後。鄭所不說，未可明言，毛氏之意，傳訓不明，唯鴻鵠傳曰：「寧三子，不可毀我周室。」二子，謂管、蔡。以爲鴻鵠之詩爲管、蔡而作。然則毛解金縢之文，其意皆異於鄭。金縢云：「武王既喪，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，周公乃告二公曰：『我之不辟，無以告我先王。』周公居東二年，罪人斯得，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，名之曰鴻鵠。」毛以鴻鵠爲管、蔡而作，則「罪人斯得」爲得管、蔡，「周公居東」爲東征也。「居東二年」既爲征伐，則「我之不辟」當訓辟爲法，謂以法誅之。如是，則毛氏之說周公無避居之事矣。但不知毛意以周公攝政爲是喪中即攝，爲在除喪之後？此不明耳。王肅之說，祖述毛氏傳意，或如肅言。王肅金縢注云：「文王十五而生武王，九十七而終，時受命九年，武王八十三矣。十三年伐紂，明年有疾，時年八十八矣。九十三而崩以冬十二月。其明年稱元年，周公攝政，遭流言，作大誥而東征。二年，克殷，殺管、蔡。三年而歸，制禮作樂，出入四年，至六年而成。七年，營洛邑，作康誥、召誥、洛誥，致政成王。」然則文王崩之年，成王已三歲。武王八十而後有成王，武王崩時，成王已十三。周公攝政七年，致政成王，年二十。肅意所以然者，以家語「武王崩時，成王年十三」。又

古文尚書武成篇云：「我文考文王，克成厥勳，誕膺天命，以撫方夏，推九年大統未集。」孔安國據此文以爲文王受命九年而崩。其後劉歆、班固、賈逵皆亦同之。肅雖不見古文，以其先儒之言必有所出本，從先儒以爲文王受命九年而崩。依大戴禮，武王之年少文王十四歲，故亦同鄭爲文王崩時武王年八十三也。受命九年，武王八十三，故至十三年伐紂，武王八十七也。金縢云「武王既克殷二年，有疾」者，并數伐紂之年與疾年共爲二年，故云「伐紂明年有疾。時武王八十八也」。禮記云：「武王九十三而終」，是爲伐紂後六年而崩也。金縢云「武王既喪」，即云「管、蔡流言」，「周公居東」，則是武王崩之後，管、蔡即流言，周公即東征也。又書序云：「武王崩，三監及淮夷叛。周公相成王，將黜殷命，作大誥。」言「武王崩，三監叛」，明武王崩後即叛，周公即征可知。故以爲武王崩之明年稱元年，周公攝政，遭流言，作大誥而東征也。金縢云「居東二年，罪人斯得」，故知二年而克殷，殺管叔也。東山序云：「周公東征，三年而歸。」明堂位稱周公踐天子之位，六年制禮作樂。故知三年歸制禮作樂，至六年而成也。東征實三年。金縢言二年者，王肅於彼注云：「或曰詩序三年而歸，此言居東二年，其錯何也？」曰：「書言其『罪人斯得』之年，詩言其歸之年也。」知營洛邑作康誥、召誥皆在七年者，以召誥說營洛邑之事，洛誥說致政成王治於新邑之事，明此二篇同是致政之年作也。康誥經云：「惟三月哉生魄，周公初基，作新大邑於東國洛。」亦言洛邑之事，明與召誥同時，故知三篇皆七年作也。肅又云然則文王崩之年，成王已三歲，致政時年二十，所以知者，以周公居攝七年而致政，明是二十成人故致之耳。致政之時成王年二十，逆而推之，攝政元年年十四，武王崩年，年十三，文王先武王十年而崩，是文王崩之年，成王已三歲也。由此而驗

之，則武王崩之明年，成王年十四，其年周公攝政，管、蔡流言，周公東征之，作七月也。所以作七月者，王肅之意以爲周公以公劉、太王能憂念民事，成此王業，今管、蔡流言，將絕王室，故陳幽公之德，言已攝政之意。必是攝政元年作此七月。左傳季札見歌幽曰：「其周公之東乎？」則至東居乃作也。居東二年，既得管、蔡，乃作鴻鵠，三年而歸，大夫美之，而作東山也。大夫既美周公來歸，喜見天下平定，又追惡四國之破毀禮義，追刺成王之不迎周公而作破斧、伐柯、九罭也。伐柯序云：「刺朝廷之不知。」王肅云：「朝廷，斥成王也。」王肅又云：「或曰：『東山既歸之詩，而朝廷不知』猶在下，何？」曰：同時之作。破斧惡四國，而其辭曰「周公東征，四國是皇」，猶追而刺之，所以極美周公。是肅意以破斧、伐柯、九罭作在東山之後，故編東山於前也。狼跋美周公，遠則四國流言，近則成王不知，進退有難而不失其聖。當是三年歸後，天下太平，然後美其不失其聖耳。最在後作，故以爲終。此則王肅義耳。未知傳意必然以否。其譏緯史傳言文王受命七年而崩，及言周公攝政四年建侯衛，五年營成周，及太子十八稱孟侯，此等皆肅所不信。

七月，陳王業也。周公遭變故，陳后稷、先公風化之所由，致王業之艱難也。周公遭變者，管、蔡流言，辟居東都。
○王業，于況反，又如字，下同。

【疏】「七月八章章十一句」至「艱難」作七月詩者，陳先公之風化，是王家之基業也。毛以爲周公遭管、蔡流言之

變，舉兵而東伐之，憂此王業之將壞，故陳后稷及居幽地之先公其風化之所由緣，致此王業之艱難之事。先公遭難，乃能勤行風化，已今遭難，亦欲勤修德教，所以陳此先公之事，將以比序己志。經八章，皆陳先公風化之事。此詩主意於幽之事，則所陳者處幽地之先公公劉、大王之等耳，不陳后稷之教。今輒言后稷者，以先公脩行后稷之教，故以后稷冠之。艱亦難也，但古人之語字重耳。無逸亦云「不知稼穡之艱難」，與此同也。鄭以爲周公遭流言之變，避居東都，非征伐耳。其文義則同。

箋「周公」至「東都」 變者，改常之名。周公欲攝管、蔡毀之，是於攝事變改也。金縢云：「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曰：『公將不利於孺子。』」周公乃告二公曰：「我之不辟，我無以告我先王。」即云居東二年，是其避流言居東都也。流，謂水流，造作虛語，使人傳之，如水之流然，故謂之流言。彼注云：「管，國名。叔，字。封於管。羣弟，蔡叔、霍叔。武王崩，周公免喪服，意欲攝政。小人不知天命而非之，故流『公將不利於孺子』之言於京師。」孺子，成王也。我今不避孺子而去，我先王以謙謙爲德，我反有欲位之謗，無以告我先王。言愧無辭也。居東者，出處東國，待罪以須居之察己。是說避居之意也。周公避居東都，史傳更無其事。古者避、辟扶亦反，譬、僻皆同作辟字，而借聲爲義。鄭讀辟爲避，故爲此說。案鴻鵠之傳言「寧亡二子」，則毛無避居之義，故毛讀辟爲辟。此八章皆是周公陳先公在幽教民周備，使衣食充足，寒暑及時，民奉上教，知其早晚，各自勸勉以勤事業，故「同我婦子，饁彼南畝」，及「嗟我婦子，曰爲改歲」。此述民人之志，非序先公號令之辭。首章陳人以衣食爲急，餘章廣而成之。計民之所用，食急於衣，宜先陳耕田之事。但耕種收斂，終年始畢，每事及時，然後能穫。則禦一年之飢，非時日之用。衣則不然，唯是寒月所須，又當及時營作，故「蠶月條桑」，「八月載績」。若此月不作，則寒時無衣。事之濟否，在此一月。偏急於衣，故首章上六句先陳人以衣褐爲急，三之日以下五句，陳人以穀食爲急，故陳人耕饁之事。人之爲衣，絲帛爲先，故二章言女功之始，養蠶之事。章之中

而再言「春日」者，此章先言執筐養蠶，因論女心傷悲感物，但傷悲在蠶生之初，陳之於求桑之下，顛倒不順，故更本春日采繁，記傷悲之節，所以再言「春日」也。衣之所用，非絲即麻，春既養蠶，秋當緝績，絲帛染爲玄黃，乃堪衣用，故三章又陳女功。自始至成也。三章既言絲麻衣服女功之正，故四章陳女功助，取皮爲裘，以助布帛。冬月衣裳雖具，又當入室避寒，故五章言將寒有漸，閉塞官室。女功衣服之事既終矣，乃說男女飲食之事。黍稷麻麥男功之正，故六章先陳男功之助，七章言男功之正。首章已言耕田之事，故此章唯說收斂之事，所以成首章也。衣食已具，卒章乃言備暑藏冰，飲酒相樂，皆是先公憂民之風教。周公陳之，以比序己志，言己之憂民憂國，心亦然也。民之大命在溫與飽，八章所陳，皆論衣服飲食。首章爲其總要，餘章廣而成之。首章上六句言寒當須衣，故二章三章說養蠶緝績衣服之事以充之。首章下五句言耕稼飲食之始，故七章說治場納穀稼穡終事以充之。論衣則舉須衣之時，論食不言須食之時者，衣必寒時所須，故可舉寒爲戒。食則無一日而不須，不可言須食之時。諸言衣裳避寒之事，〔三〕則引物記候，言飲食耕田之事，則不記時候，皆此意也。卒章說饗飲之禮，獨言「九月肅霜」者，饗飲之禮必農隙乃爲，故言「肅霜」「滌場」，以見農功之畢。若其餘飲食，則不得記時，故六章、七章無記時之事。絲麻布帛衣服之常，故蠶績爲女功之正，皮裘則其助。四章箋云：「時寒宜助女功。」言取皮爲裘，助女絲麻之功也。黍稷菽麥飲食之常，故禾稼爲男功之正，菜果則其助。六章箋以鬱薁及葵棗助男功，又云瓜瓠之畜助養農夫，言取瓜瓠葵棗助男稼穡之功也。女功之助在四章，男功之助在六章者，二章三章是女功之正，故四章爲女功之助。七章是男功之正，故六章爲男功之助。欲令男女之功，正助各自相近者也。女功之正及秋而止，其助在盛冬之月，〔四〕事在正後，故在正後也。男功之正冬初乃止，男功之助在於夏秋，事在正前，故在正前也。又養蠶時節易過，恐失其時，殷勤言之，故二章三章皆言養蠶之事。耕稼者，一年之事，非時月之功，民必趨時，不假深戒。首章已言其始，七章略言其終，不復說其芟耨芸耕之事，故男功之正少，女功之正

多也。絲麻之外，唯有皮裘，可衣者少；黍稷以外，果瓜之屬，可食者多，故男功之助多，女功之助少也。女功助在正後，故五章女助下言女功畢。男功正在助後，故七章男功正下言男功畢。男功正後猶有茅索之事，女功正後不言有事。孟子稱冬至之後女子相從夜績，則冬亦有績麻，但言不備耳。先公之教急於衣食，四章之末說田獵習戎，卒章之初說藏冰禦暑，非衣食之事而言之者，廣迷先公禮教具備也。閑於政事，然後饗燕。卒章說飲酒之事，得其次也。毛、鄭注雖小有異文，意則同。

七月流火，九月授衣。

火，大火也。流，下也。九月霜始降，婦功成，可以授冬衣矣。

箋云：

大火者，寒暑之候也。火星中而寒暑退，故將言寒，先著火所在。

一之日觱發，二之日栗烈。

無衣無褐，何以卒歲？

一之日，十之餘也。一之日，周正月也。觱發，風寒也。二之日，殷正月也。

賤者無褐，將何以終歲乎？是故八月則當績也。

○觱，音必，說文

作「畢」。發，音如字。栗烈，並如字，說文作「颶颶」。褐，音曷。

三之日于耜，四之日舉趾。

同我婦子，饁彼南畝，田畯至喜。

三之日，夏正月也。幽土晚寒，于耜，始脩耒耜也。四之日，周四月也。民無不舉足而耕矣。

饁，饁也。

田畯，田

大夫也。箋云：同，猶俱也。喜，讀爲饁。饁，酒食也。耕者之婦子俱以饁來至於南畝之中，其見田大夫，又爲設酒食焉。言勸其事，又愛其吏也。此章陳人以衣食爲急，餘章廣而成之。

○耜，音似。饁，炎輒反，野饁也。

字林于劫反。

畯，音俊。喜，王申毛如字，鄭作「餧」，尺志反，下同。夏，戶雅反，下「染夏」、「夏小正」同。晚寒，如字，謂晚節而氣寒也。饁，其愧反。饁，式亮反。又爲，于僞反。

【疏】

「七月」至「至喜」毛以爲周公云，先公教民周備，民奉上命。於七月之中有西流者，是火之星也。知是將寒之漸，至九月之中，云可以相授以冬衣矣。九月之中若不授冬衣，則一之日有鬢發之寒風，二之日有栗烈之寒氣，此二日者，大寒之時，人之貴者無衣，賤者無褐，何以終其歲乎？故至八月則當績也。又幽人從君之教，三之日於是始脩耒耜，四之日悉皆舉足而耕。俱時我耕者之婦子，奉饋食餉彼南畝之中耕作者，田畯來至，見其勤農事，則歡喜也。幽公憂念民事，教之若此。周公言「憂民亦與之同，故陳之也。○鄭唯「田畯至喜」言田畯來至，農夫爲設酒食爲異，餘同。

箋「大火」至「所在」春秋昭十七年，有星孛於大辰。公羊傳曰：「大辰者何？大火也。」哀十二年左傳曰：「五」「火伏而後蟄者畢。今火猶西流，司歷過也。」謂火下爲流，故云流下。言六月昏見而中，則流下也。可以授冬衣者，謂衣成而授之。

箋「大火」至「所在」昭三年左傳，張趯曰：「火星中而寒暑退。」服虔云：「火，大火，心也。季冬二月平旦正中在南方，大寒退。」季夏六月黃昏，火星中，大暑退。是火爲寒暑之候事也。知此兩月昏旦火星中者，月令：季夏昏，火星中。六月既昏中，以衝反之，故十二月旦而中也。若然，六月之昏，火星始中。堯典云：「日永星火，以正仲夏。」注云：「司馬之職，治南岳之事。得則夏氣和。夏至之氣，昏火星中。」所以五月得火星中者，鄭志孫皓問：「七」「月令季夏火星中，前受東方之體，盡以爲火星季夏中心也。不知夏至中星名？」答曰：「『日永星火』，此謂大火也。大火，次名。東方之次有壽星、大火、析木，三者大火爲中。故尚書云舉中以言焉。又每三十度有奇，非特一宿者也。季夏中火，猶謂指心火也。如此言中，則『日永星火』謂大火之次，非心星也。堯典四時言中星者，春夏交舉其次，言「星鳥」、「星火」，秋冬舉其宿，言「星虛」、「星昴」，故注云「星鳥，鶉火之方。星火，大火之屬。虛，玄武中虛宿也。昴，白虎中宿也。其東方、南方皆三次，鶉火、